



在派克这一头，他用了一句很具体而朴素的话说出和汤姆士结交的原因，他说“在汤姆士这个人身上初次找到了一个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人。”这句话里我们应注意“说同样语言”这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派克社会学里的“关键词”。派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群能交谈的人组成的集体。交谈就是用同样语言说话。社会也就是通过共同语言交谈的这些人组成的。这些人达到了心心相印，互相了解，在行为上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一件集体行为，成为一个社会实体。派克花了半生指望能用科学方法来理解社会，而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办得到的，必须有若干人一起配合起来成为一种集体行为。这种集体行为的基础是要有一批说同样语言的人，也就是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集体来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个前提进而包涵着后来发生的派克和汤姆士相结合的这件事。

我们应再注意他用“初次”两字。说是初次也就等于说过去他没有遇到过懂得他语言的人。他在这里所说的语言当然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而是有关他所要实现的那件建立社会学的事体的语言。再换一句话来说，他到那时为止还没遇到一个真正志同道合的人，可以结合起来完成他理想中的事业。我们重复细味派克这句话，应当理解他的苦乐所在。苦是苦在知己之难得，乐是乐在最后“初次”见到了这个说着和自己同样语言的人。这不是“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么？他不是说他乐于和这个说同样语言的人一起工作么？这比了‘这是一生的大事’的直感，说得明白得多了。其实这两人的感觉是一回事。派克在关于这件事的札记里正表现了他在用他的社会学的语言。这是一门联系实际生活的社会学。

我在派克和汤姆士两人的结合上发生了这一段遐想，同时又更感到我对派克社会学确实有初入堂奥之感，现在人已老才进行补课，似乎已经迟了一点。但话又得说回来，到了暮年还有一个补课的决心和机会，应当同样感到是件乐事。

我想在这节之末加一段有关汤姆士这个人的话。汤姆士论年龄比派克大一岁，是 1863 年出生的，比 Small 小十岁。他出生在 Virginia 乡下，属荷兰农民的后裔，1889 年毕业于 Tennessee 大学后就在这个大学里教语文，接着去德国留学，1889-1893 年在 Oberlin 学院当英文教师，他对此职不感兴趣，回头投入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跟 Small 学社会学，1896 年获得博士学位，1910 年升为教授，是芝加哥大学培养成材的第一批美国社会学家。但是当时他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同意又不愿追随 Small 那种偏重历史的观点，而有意自创新路，所以他当时自称还在社会学边际上徘徊。后来他和一个波兰移民学者 F. Znanieski 合作实地调查欧洲大陆的波兰农民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写成《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生活》(1918) 一书而一举成名。但当这本书还没有全部出齐时，却发生了一件被当时芝加哥当地报纸抄热了的“私人丑闻”，FBI 在一家旅馆里把他拘捕了起来，虽则后来判定无罪，但名誉受损被迫辞去芝加哥教授一职。有人认为这件事是汤姆士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过于积极参与和平运动所引起的。派克是同情汤姆士的，但无从出力相助，虽则后来他还是用自己的名义出版了汤姆士所写的“波兰农民”的续编，《旧世界传统特色的移植》(1921) 在社会学界取得了名著的地位。关于汤姆士和派克在社会学观点上的配合，留待以后再说。

### 十一、从探险者成为拓荒者

派克老师能成为个社会学家的本钱或智源，主要是他在前半生 49 年里积聚在他所谓“思想库”(thinking tank) 里的那份雄厚的贮存。这笔丰富的智力资源得之于他这段生命中的社会经历。



我记得在燕京大学课堂上听他讲的第一堂课时他就开门见山的要我们从实际的社会生活里去学习社会学。他一再教导我们这批想学社会学的年轻学生说，学社会学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自身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社会学的素材，而我们每个人都成天在社会里生活，研究社会学的资源到处都是。如果我当时真的明白了派克老师这个听来似乎最简明的教导，也就不会到现在这须眉皆白的时候还需要下决心来补课了。

派克老师这句“社会学就在自己的生活里”的教导，不仅说出了派克社会学的关键词，听起来很简单，而实际上是他用了半生奔波的生活作代价才得出的结论。这句话本身总结了他几十年里思想领域里探索的收获，实在是经验之谈。甚至可以说派克老师所讲的社会学一直没有半点脱离他自己切身的实际。他本人的生活实际充实和丰富了他的社会学的内容，同时也可以说局限了他社会学的阵地。当然社会学家本身的生活内容并不等于他在思想领域提炼出来的社会学。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一切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讲解，没有不是以自身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体验为基础的。派克老师所讲的社会学，处处都是从他生活经验中产生的。他的社会经验通过他思想上的提炼，贮存在他的思想库里，经过不断的磨练，成了他的社会学。他本人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角色和地位。

具体地说派克老师本身的社会经历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他早年的学校生活和 11 年的记者生活，第二段是他在美国南方 7 年中和黑人一起过的生活，第三段就是他的长达 51 年的后半生，包括他在芝加哥大学里作为社会学教授的生活，以及他退休后在太平洋周围各国的考察和旅游。

这三段生活对他的社会学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一段正如在这篇札记的前几节所说的，被人称作是他作为一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的时期。探险者意思是指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是什么还不清楚。

派克老师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在美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固然已经在大学里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可以说社会学在美国已经不再是个探险的对象了。但是对派克本人来说他还没有明确当时他所追求的对象就是“社会学”。我们可以说当时在他思想库里所存贮的资源实际上已经是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社会学”的东西了，但他自己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认识。经过汤姆士的努力，把他拉进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这是个在社会上公开挂上了牌子的社会学的机关。这时派克老师才固定下来成为个社会学的拓荒者，而不能再说他是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了。

把派克老师归入社会拓荒者的一代的是 Everett Hughes，他的意思就是指在美国创立社会学的一代。这个说法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就是提醒了我们社会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的诞生还是我上一代人的事。说它年轻是指它还没有成熟的意思。这种认识和定位使我们要时刻记着年轻有它的好处，也记着年轻有它的弱点。好处是在它的创新精神，弱点是在它没有已定型的道路可循。

Hughes 列举出了社会学拓荒者的学术出身，说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人：法国的 Leplay (1806-1904) 和意大利的 Pareto 早年都是学工程的。美国的 Tarde (1834-1904) 法国的 Durkheim (1858-1917) 早年是学法律的、德国的 Max Weber (1864-1920) 和美国的 L. H. Cooley (1864-1929) 早年是学经济学的。美国的 Lester Ward (1841-1913) 原是个生物学家，英国的 Herbert Spenser (1820-1903)、德国的 Georg Simmel (1858-1918) 原来都是哲学家。派克老师自己在大学里名义上也是学哲学的学生，他在哈佛大学所得的学位也是哲学博士。





在 Hughes 列举的一些社会学拓荒者一代里，特别提到汤姆士（1863-1947）是个例外，他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第一批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人，他是当时已称社会学教授的 Small 的学生。但是他在学术上其实是和派克先后走在一条路上。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从人们实际生活里出社会学。

汤姆士著名的《波兰农民生活》一书，在写作上就一变当时社会学著作常见的体裁。全书共 2250 页，分 5 册装订，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移居在美国的波兰人和家乡农民间往来的私人通信，和有关他们的传记，并补充了从波兰语刊物上选录出来的资料。派克的学生 Blumer 1979 年说这种作风是表明他对“讲座式社会学”（armchair sociology）传统的反叛。他把私人通讯和个人传记汇编在这本书里，作为专著的主要内容。我想他的目的就在想让读者们能直接看到波兰移民和家乡农民社会来往的原始资料，使读者能闻到一些生活气息和领悟一些“言外之意”。

派克对我印象最深切的教导就是他亲自领我们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不仅要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而是一再教导我们要看出和听出动作和语言背后的意义来，就是要理解或体会到引起对方动作和语言的内心活动。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朵去听，而必需联系到自己的经验，设身处地的去体会。这种“将心比心”的活动在我国传统中是经常受到重视的。

我想起了老前辈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中强调的“神游冥想”时，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句话里所说的同一境界和表一种之同情，在我看来也就是用本人内心的经历去体会和认同于古人的处境，以心比心，做到思想上的互通。这个求得对古人持论立说的“真了解的途径”，其实也适用于一切人对人的互相了解的社会关系之中。派克把“知己”作为“知人”的根据，揭出了人和人能在社会关系中结合的关键。上节札记里我提到的派克和汤姆士两人的结合其实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 十二、派克老师在备课

在上几节里我说，派克前半生可说是个思想领域里的探险者，他探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门以研究人际关系为对象的学科。当他进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后，他成了被称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拓荒者，意思是这门学科的内容和研究方法都还没有立出章法，也就是说社会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没有一个共识，所以说这还是学术上的一片处女地，有待学者去耕耘成为一块人们知识的熟地，不断可以产出对人们社会生活有用的知识。

派克老师辞掉作为卜干·华盛顿这个美国黑人领袖的助手，在脱斯开奇黑人学校里工作了 7 年之后在 1913 年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任为该大学神学院（Divinity School）教授级讲师（Professorial Lecturer）。派克老师虽则自己主观上有进入科教园地完成了觅取职位的志愿和雄心，又有汤姆士的大力推荐，但是看来一开始并没有顺利地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地位，说明了世事的坎坷。但是派克老师素来淡视名利，所以这种遭遇并没有阻碍他走上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而且他又善于逆来顺受，把坏事转为好事。他在新的岗位上，能充分利用这个教务负担比较轻、闲暇多的条件，来为他向学生讲授社会学作准备。他在从 1913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到 1916 年提升为社会学教授的 3 年时间里，尽量设法充实他对社会学内容的建设。主要是通过阅读（reading）梦术（dreaming）和思考（thinking），进行备课。



在继续写我这些补课札记的过程中，我本人不断受到生活波动和思想发展过程的冲击，写完第十二节之后几乎停笔了有两个多月，1999年的5月和6月。这次停笔一方面是由于我打算去京九路串糖葫芦（“串糖葫芦”是我最近二年里采用的一个形象性的专称，指的是想按京九铁路线发展一连串互相衔接的中等城市型的经济中心），这个设想是我在区域研究中的新思路，也是“行行重行行”研究工作上的新课题。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这篇“补课札记”的写作上遇到了一个难点。

如果我按派克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自然史的历程来写，接下去应当讲派克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后的“下半生”了，也就是按我利用 Raushenbush 的这本《派克传记》作拐杖，按这个次序写下去，可以同读者讲讲这位老师怎样在教授这个职位上推动美国社会学的成长。用这个思路来继续写我的《补课札记》就比较容易下笔，但是我另一种想法是利用这本《札记》记下一些派克所阐发的社会学的实质问题，例如他在这时期写下和发行较广的几本重要著作的内容。至少我可以记下一些我对“派克社会学”内容的体会，那就是说我在这本《札记》里要引出我对社会学内容本身的想法了。如果顺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我就不能不估计一下自己这一生还能有多少时间供我这样消耗了。尽管每年一度的体验，似乎都表示我不至于在很短时间内就会结束我这一生。但这是难于预卜之事。若要使这本《补课札记》不致成一本“完不了的乐章”。我还是挑一条易于完成的路走为妙。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面在车子里旅行和在各地的宾馆里休息，但心里还是一直在思考怎样把这本《札记》做个结束。最后还是决定从派克老师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一刻起，继续用《派克传记》作拐杖写下去。所以接下去应当是讲他怎样利用进了芝加哥的头三年“备课”时期的生活。我采用了《传记》里提到的三个词：阅读、梦求和思考来作为这一节札记的提纲。这三词不经意说出了这位老师一生奉献给社会学的一贯精神。正如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所说的，看来这位老师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建立起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他可以为此废寝忘食，甚至他的家人已习惯了他不按时回家就餐的生活规律，不再和他计较这些常常会打乱别人生物钟的麻烦。他可以和他同室办公的同事们争辩得津津有味停不住口，而难为了服务员不能按时下班。他可以指使在上班路上遇到的学生改道前进，以免打断他正在思考将在班上讲话的腹稿。他可以等不及结好领带匆匆上台开讲，而有劳班上的学生在听讲之前要为他整理一下衣襟，甚至要替他擦去刮胡子时留下的肥皂。他的心里不在这些上面，而是在思考、思考、再思考。他竟成了个不修边幅的书呆子，在英文里是个十足的 *absent minded professor*。上述这些在芝大校园里流行的笑柄，是我在各种讲到这位老师的回忆文章中得知的，并不是我自己的印象。他在燕京讲学的那个学期，在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是个最守时刻的老师。我却是个最喜爱睡懒觉的学生，他总是比我先一步进教室上课。这件事我一直对他有意见的。

关于上面所说的三条提纲里的“梦求”这一条，是我从原文 *dreaming* 一字翻译来的。我没有核实过他在梦里是不是还是忘不掉社会学这门学科。对这个问题我是无法核实的，但是我相信他经常会“梦见周公”的，因为他的学生们都说他是个有了问题决不肯白白丢掉的人。许多学生记下由于这位老师不断的追问才使自己豁然贯通的经验。这位老师最不高兴的是学生脑中经常在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脑中没有问题迫着自己，怎能使一个人的思想不断前进和推陈出新呢？他这样要求学生，因而可以推想他一定同样对待自己的。如果睡眠时还带着个没有得出答案的问题，那不就会带入梦中了么？所以我想用梦求一词来说他不让脑子里的问题过夜也许确



有此境。

关于通过读书来备课那是不必多说的了，因为他所编的这本《作一门科学的社会学导论》即那本多年在美国各大学中风行的社会学教科书，本身就是一本他的读书记录。是一本根据他为社会学提出的纲目。搜集各家有参考价值文献资料的汇编。这些都是经过编者反复阅读各家原著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对每一个有关社会学的纲目下的历来在西方社会学论坛上有代表性的论点几乎都被采用来作为引导学生入门的台阶。在这样的目的下，编者所需阅读的资料之繁重就难以估计了。这笔账，我们且不去计量，但在这里特别应当说一说是派克读书的特点。《派克传记》的作者认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对冷门书的重视和所得到的收获。

有人把派克社会学说成是从“集体行为”(Collect Behavior)开始以“人文区位学”作结法。“人文区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是派克老师最先提出来的。他从读冷门书中得到启发，不断联系他的社会学思考，培养出这一门他没有能及身完成的学科。《传记》的作者说：在他进入芝大的头几年里他主要是读书备课，他遍读各家不熟悉的社会学著作外，他喜欢在图书馆里寻找冷僻的书本。一旦找到了一本他认为是好书，就像大热天跃进了一个清水池塘，不计深浅界限，没头没脑地钻进去尽情享受。他就是这样发现了其他社会学者没有发现过的这个新领域，就是他后来发挥培育的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

启发他进入这个“人文区位学”的那几本冷门书就是：Engenins Warming 的 *Ecology of Plant* (植物区位学)，那本书的英文译本是 1909 年初次出版的；W. M. Wheeler 的 *The Ant colony as an Organism* (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蚂蚁窝)；Charles C. Adam 的 *Grade of the Study of Animal Ecology* (动物区位学导论)和 1915 年出版的 C. J. Galpin 的 *The Social Anatomy of Agricultural Community* (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学)。

他阅读了这些冷门书之后，高兴得甚至要劝他的儿子 R. Hiram Park 专修这门人文区位学。他这位儿子曾经记下：“在 1915 年或 1917 年，我记得爸爸在 Lansing 停了一会儿，他有一个想法：要我研究植物和昆虫的区位学，他向我解释说这些比人文区位学要简单些，但是如果我有志于研究人文区位学，这些书会对我大有用处。我明白他的意愿，但没有跟他指示的方向走，因为我已电学和机械学方面花尽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这个世界看来将向高度技术化发展，我想为此做出准备。”

如果不是派克老师对人文区位学前途是有那么大的信心，他不会动员他的儿子去研究这门学科了。我已说过这门学科他只破了题，但并没有在他的一生中建立起来。连他多次想用“人文区位学”的名称写的一本专著都没有落实。这是后话。但在我这本札记里可以提到这件事来说明他怎样去挑选书本来阅读的。从冷僻的闲书中容易有新鲜的启发，取得学术发展的新途径，派克老师就是可以为此作证的学者。

(未完待续)

